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精耕细作」

□ 刘宇

“精耕细作”原意是指我国古代农业的生产模式和田间管理体系，描述的是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劳动和技术，通过认真细致的土地耕作，以最大限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它高度凝练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典型特征。党的领导人对该成语的经典引用出自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做革命的促进派》的报告中，提到“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后也用该成语比喻做事认真、专注细致、持续深耕，通过集约运作达到提升产能、提高效率、改善效果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精耕细作”运用到贸易投资、人文合作、干部成长、对外开放、企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极大扩展了该表述的适用范围，丰富了其内涵要义，对各级干部准确把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4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尔出席中韩经贸合作论坛时强调，中国对韩投资尚处于起步，“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只要精耕细作，一定会莲香十里飘。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是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的主要指标，也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密切国家交往的重要引擎。发挥好贸易投资的牵引和带动作用，对于加强双边经贸往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都大有裨益。为此需要持续扩大投资开放领域，提升跨境要素流动效率，建立更加开放的政策体系，打造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以更好保障人员、货物、资金、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16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唯有人文相亲，才能持久推动经济相依、文化相融、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致力于打造的是各国密不可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倡议提出以来，各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范围不断延展，成果持续显现，有力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成为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情感纽带，也为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应有担当提供了重要平台。

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年轻干部培养，不能搞大水漫灌，更不能任其自然生长，要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施肥浇水、修剪枝叶、驱虫防病。年轻干部具有思维活跃、精力旺盛、知识体系新的优势，也有经验不足、历练不够、定力不强的短板，要对照“德能勤绩廉”的考核导向，聚焦“育选管用”的重点环节，尊重内在规律，兼顾个体差异，注重因势利导，突出精细精准。在干部从政全周期和履职全过程中，既用“公平尺”一量到底，也用“显微镜”见微知著，还用“望远镜”深谋远计。通过对年轻干部全覆盖纳入、分层培养、梯度化锻炼、常态化监督的教育管理，努力做到优生、精选、严管、善用，让年轻干部在多“墩墩苗”的历练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担当作为，练就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硬脊梁、铁肩膀和真本事，成为党和国家需要、人民群众信赖的先锋力量。

2018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所致的贺信中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希望投洽会以双向投资促进为主题，精耕细作，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精品，办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积极作用。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面临的内外部形势都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从外部看，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世界处在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从内部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动开放型经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重速度规模向重质量效益转变，着力形塑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形成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形态，展现我国强劲的经济韧性、充足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合作空间，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2022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的贺信中强调，希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和社会稳定的“神经末梢”，涉及千家万户，关乎国计民生。近年来，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脱颖而出，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亮点。这些企业在工业基础领域精耕细作，通过以专注铸专长、凭深耕得优势、靠配套强产业、用创新赢市场的运作模式，展现出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鲜明特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支持和纾困解难，能够筑牢经济基本盘，稳住社会基本盘，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这既是增强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壮大实体经济，防止脱实向虚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社会形态”

□ 李 艳

“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人类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核心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解释他们的社会观所创制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社会形态”的内涵存在多重理解。本文从社会形态的德语原文“Gesellschaftsformation”出发，来理解马克思视野中的“社会形态”的涵义。

社会形态不是天然的、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生成的和发展的。“社会形态”即“Gesellschaftsformation”，是“Gesellschaft”（社会）和“Formation”（形成物、组成物）两个词的有机合成。“Formation”借用了地质层系术语“Geologicalformation”的词尾。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首次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个概念：“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也反复提及。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依然延续了这一思路：“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在[二稿]中还有：“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年代的叠复的地层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类型。”可见，马克思应该是有意识地将社会形态的演变与地质层系、地质构造进行关联。

社会形态标识了人类社会的动态性、阶段性和历史性特征。“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这就是说，在对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进行理解时，不应该把它孤立看待，把它视为永恒不变的现成存在；而应该把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形态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之中，把社会形态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的某一阶段或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曾分别从生产方式、人的发展和生产力三个维度分析过社会形态的历史性特征，揭示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

社会形态的演进类似自然史的过程，但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形态包含着实践活动主体的主动选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形态的演进机制做过经典的论述：人类的生产性活动是人类社会一切关系形成的基础，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个体从事创造性活动必然脱离不了其他人，必然要与其他人形成呼应，社会结构就生成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互动中。其中，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是由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推动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家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他们把封建制度视为人为的，把资产阶级制度看作天然的、“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只是因为封建制度是同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这反映了经济学家们对待人类社会历史的任意性。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是不为个人的目的和意志所决定的客观发展过程，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与自然界一样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这一规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而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过程。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共时性地存在着多种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是不同种类的，具有不同层次性，通过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被组织起来。“地球的古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年代的叠复的地层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类型。”在这句话中，“古代”社会形态是对社会形态的时段限定，标识出社会形态所处的历史时段范围。而共时地来看，地球的古古结构或原生结构其实包含着不同年代的地层；古代社会形态也是由多个类型组成

的，比如，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日耳曼就代表了原始形态的三个不同时期。这三种形态都采取公社所有制的生产方式，因而可以被划分为原始社会类型。但三者之间公社所有制的占比量又各不相同，因而在发展形态上呈现出高低程度之别。“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里“普照的光”的隐喻也隐含了一定社会形态包含的多种生产方式，而被“普照的光”所遮盖的正是其他类型的生产和由此形成的关系。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都包含不止一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总是作为从属部分，逐渐地从孔隙之间生出萌芽进而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延展开来。资本早在14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却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形态中出现，但还是偶然、零星地存在着，因而是“并没有发育完全”的状态。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世纪“站稳脚跟”后继续扩大和发展才最终成为主导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只有当资本生产方式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成为主导，或者已经不再仅仅是零星地存在，而是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都从属于资本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才真正生成。可见，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系列的类型”的模态组合，包含不止一种生产方式。

社会形态作为多种生产方式的共存，暗含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通过对社会形态历史性演变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势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具体的国家的发展道路却可以各不相同。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此作出明确论述，他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改造

为强加给每个民族的历史哲学理论。事实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述了西欧社会形态演变的独特性。他们指出，如果没有西欧的历史条件，就不会有基于农奴制的西欧封建制度，也不会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张应该回到各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对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因为即使是相似的现象，出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俄国社会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发展路径，而是具体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并得出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两种可能性选择。最终选择哪种道路，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实践决定意识，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阶级意识，在面临社会转型时，不同阶级会作出不同的选择。社会形态的选择是客观必然性与主动选择性的统一。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扩大了其社会形态理论的经验基础，加强了对非欧洲国家、原始社会的历史研究，在1879—1882年期间他们形成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前者侧重于经济和社会制度，后者侧重于政治和国家历史。这两个笔记的内容对于整个历史研究来说是互为补充的。就各自的篇幅而言，前者主要涉及非欧洲国家，后者则涉及欧洲国家。将这两个笔记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是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制高点上，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统一性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而这种重新审视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检验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理论体系，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为人类的解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

□ 杨建林

大道理是关于大是大非的道理，是带有根本性、原则性的道理，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规范人们基本行为的道理。小道理是指只注重局部和眼前利益，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有意无意把大道理简单化、庸俗化，甚至进行极端曲解，导致思想认识有偏差、工作落实陷入“空转”。毛泽东讲过：“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我们必须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树立大局观、整体观、系统观、长远观，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把地方、部门和行业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之中，真正做到既为一域增光、更为全局添彩。

小道理现象的存在，表面上看是认识偏差、学习不足、能力不够的问题，实质上是理想信念、革命斗志、党性修养的问题，具有根本性、顽固性、欺骗性。其成因有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上有漏洞。制度旨在规范人们的行为，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然而，正如任何复杂的系统都难以完美，制度亦有其盲点与缝隙，这就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利用制度的漏洞找寻变通、曲解的机会，导致小道理潜滋暗长。

二是需求侧有市场。人们对于小

道理的追求，实际上是对特殊利益的一种需求，当大道理无法满足某些人的特定需要时，小道理便有了存在的空间和温床。各种小道理作为特殊的产品，有其特定的“粉丝”，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愿意听从甚至积极扩散传播小道理，处心积虑用这些小道理为自己谋取私利营造说辞。三是操作上有成例。在现实中，小道理的存在往往源于有成例可循。披着“成功学”外衣的小道理，嫁接各种专业名词，捏造各种歪理邪说，蛊惑一批盲从者参与其中。这些人被眼前的“海市蜃楼”所迷惑，都想以走捷径、抄近道谋求短平快的“成功”，实则欲速不达，最终落得头破血流、两手空空。

四是个人有私心。私心，常常使人偏离航道，罔顾大道理、痴迷小道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有的人明明知道大道理对、小道理不对，但当大道理与个人利益不一致时，他们更愿意搞着明白装糊涂，一边作秀表演，一边谋取私利。

小道理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对我们的事业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都极其有害，必须标本兼治、露头就打，为大道理的正道直行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民族的强烈认同，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映照初心使命，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牢记使命才能更加坚定。理论上的“信仰度”，决定对党的“忠诚度”和对党的事业的“执着度”。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和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保持清醒头脑，坚定政治方向，更加自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奋斗。

运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把我们的事业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观察，将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审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把党和国家事业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去谋划、放到世界发展大势中去把握，不断增强谋划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第一位的就是要学懂弄通做实、内化深化转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矢志不渝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构建深学常学实学机制，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真正把大道理的要求变成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变成日常工作的基本遵循。

做到知行合一。“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只有行动上落严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深入。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诚捍卫者和积极建设者。

